

姜振昌 / 著

帮朝花社，

而无不或失败，

或受欺”。

他曾不无感慨地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

形和自己的心境：

“昔之称为战士者，

今已蓄意险仄，

或则气息奄奄，

甚至举止言语，

皆非常庸鄙可笑，

专为伍则难堪，

与战斗则不得，

归根结蒂，

# 中国现代杂文史论



43.496  
J2C

姜振

中



43.496  
J2C

现代杂文史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杂文史论/姜振昌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02-002158-1

I.中… II.姜… III.杂文-文学史-中国-现代 IV.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484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5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定价 13.60 元

# 目 录

绪 论 崛起在尴尬的时代夹缝中 .....	1
引言 现代杂文基本成就评估 .....	1
一 时代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的时代意识 .....	5
二 忧愤、骚动中的抉择 .....	16
三 深井出旺泉 .....	21
第一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	
——“五四”杂文在默默耕耘中勃兴 .....	28
第一节 辉煌的开端：先行者的足迹 .....	28
第二节 “人性的解放”与“五四”杂文的社会性批判 .....	37
第三节 文体意识：朦胧中的自觉与自觉中的朦胧 .....	48
第二章 从块垒的组合到扇面的分化(上)	
——语丝派的形成与杂文的深化 .....	53
第一节 邂逅与选择 .....	53
第二节 社会性批评的深入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强化 .....	61
第三节 “语丝文体”：对艺术真谛的领悟 .....	73
第三章 从块垒的组合到扇面的分化(下)	
——语丝派的分化与三大流派的形成 .....	86
第一节 雪崩何处? .....	86
第二节 鲁迅(派)：独立不倚，奋然前行 .....	91
第三节 周作人派：“言志”意识的强化与迷误 .....	99
第四节 林语堂派：从“讽刺”到“幽默” .....	105

<b>第五节</b>	三水分流的个性演示：鲁迅、周作人、 林语堂的主观意向分析·····	110
<b>第四章</b>	三十年代杂文：在冲突中递嬗行进·····	116
<b>第一节</b>	压制与冲决压制之间·····	118
<b>第二节</b>	论争，杂文发展的导向·····	135
<b>第三节</b>	反杂文作家的“塞”与“行”·····	149
<b>第五章</b>	“形象化”系统	
	——鲁迅杂文的三个艺术世界·····	157
<b>第一节</b>	“杂文形象”的艺术本质蕴含·····	159
<b>第二节</b>	赤裸裸的自己·····	170
<b>第三节</b>	曲笔：议论形式的根本艺术特征·····	180
<b>第六章</b>	“鲁迅风”的活力与“活鲁迅”的风范	
	——“孤岛”杂文概观·····	190
<b>第一节</b>	民族的命运和战士的箭镞·····	191
<b>第二节</b>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198
<b>第三节</b>	承继观念的执著与超越意识的跃动·····	205
<b>第七章</b>	解放区作家的窘迫和尴尬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杂文运动·····	210
<b>第一节</b>	与鲁迅精神的契合：消不掉的杂文情结·····	210
<b>第二节</b>	循循善诱的思想文化批评·····	215
<b>第三节</b>	行为失范和意识误区里的谏诤警示·····	220
<b>第四节</b>	历史不了情：批判杂文运动的精神备忘·····	225
<b>第八章</b>	战争激流和作家之舟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杂文 创作流向描述·····	233
<b>第一节</b>	战时杂文的“共时态”旋律·····	233
<b>第二节</b>	历史：杂文的对象和契机·····	244
<b>第三节</b>	艺术格调的承继与变异·····	250

第九章 聂绀弩：大器晚成，透发新声 .....	260
第一节 深情与思想 .....	260
第二节 勇气与才气 .....	270
第三节 “乱真”与新变 .....	277

## 附 录

中国现代杂文史事编年 .....	281
------------------	-----

后 记 .....	345
-----------	-----

## 绪 论

### 崛起在尴尬的时代夹缝中

#### 引言 现代杂文基本成就评估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以“形式大换班”拉开帷幕的，古典诗、词、曲一下子失去了它正宗的地位，文言小说也很快销声匿迹，而新诗、白话小说、话剧、杂文、散文等一些面目全新的文学体裁，则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五四”落潮之后，尽管风云变幻，浊浪迭起，这些文体仍然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为刚刚诞生的中国新文艺带来了勃勃生机。

但是，这些新的“体裁群”的发展并非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如果有人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是什么？笔者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杂文。其实，鲁迅、胡适、林语堂等先驱者们早对这个问题作过结论<sup>①</sup>，茅盾甚至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sup>②</sup> 细细考察，杂文受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五四前后，杂文的起步与其他文体相比是较晚的，它没有像新诗那样有过理论的酝酿过程，也不像白话小说有一条隐隐发展的链带，但也没有像它们那样步履艰难（新诗甚至直到今天还在探索应走的路）；当作家们选中这一文体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

---

<sup>①</sup> 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

<sup>②</sup> 《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第11页。

感而发的时候，已经很难获得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作深入的思考和充分的准备，他们简化了繁杂而必要的过程，迅捷地切入了创作的正题。显然，中国现代杂文的出现和成功几乎是突如其来的：自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期开辟“随感录”栏以后，各种刊物竞相效仿，《每周评论》、《新社会》、《新生活》、《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都以很大的篇幅设立了专栏。“五四”以后，杂文的发展更是深入扎实，不仅先后出现了诸如《语丝》、《申报·自由谈》、《太白》、《野草》、《鲁迅风》、《杂文丛刊》等专门的杂文刊物，而且很快发展到几乎每家综合性文学刊物都披载这种文体。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个浩如烟海般的杂文世界。如果想弄清它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单靠少数人短期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个人的统计都难免挂一漏万。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出版的杂文集约有四百种<sup>①</sup>。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然而与它在报刊上实际产生的数目相距仍然十分遥远。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杂文集的出版是十分困难的。例如，自1919年至1929年10年间出版的杂文集总共不足30种，所收作品1200余篇，而仅《晨报副刊》一家在五四时期就刊出上千则。五四时期刊登杂文的报刊，少说也有上百家。到三十年代，情形虽略有好转，但结集出版仍“不及诗歌，更赶不上小说”（鲁迅语）。许多作家一生为写杂文呕心沥血，却竟不能有一本杂文集问世。首先应提到的是徐诗荃，他以梵澄、冯珧、迹余、区区、闲斋、梵可等为笔名发表的杂文，总数不下三四百篇，从《语丝》、《奔流》到《人间世》、《新语林》、《申报·自由谈》等都可时常见到他的名字。他构思敏捷，落笔又快，有一个时期，《自由谈》的“花边文学”几乎由他一人包办了。徐诗荃是

---

<sup>①</sup> 均为初版本，详见本书附录“中国现代杂文史事编年”。



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邵力子、陈子展、钱玄同、张恨水、石灵、罗烽、萧军、草明等也都是较为多产、却从未有过杂文集问世的知名作家<sup>①</sup>；王任叔虽然出版过《生活、思索与学习》、《边风录》、《窄门集》以及同别人合编的《边鼓集》、《横眉集》等多部杂文集，但所收文章仅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左右。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他发表的杂文约600余篇，总数同鲁迅的差不多。这类作家的名字，我们还可以列出夏衍（总数同王任叔差不多）、老舍、周而复、胡风、周木斋、梁实秋、何其芳、吴晗、瞿秋白等长长的一大串。许多作家并不顾及结集出版的难易，他们是抱定一种旋生旋灭的心态进入创作的，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与被鞭挞的对象一同“速朽”，因而并不留神对它的收集、“珍惜”，有的连自己究竟有多少作品也说不清，甚至“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sup>②</sup>。这表明，中国现代杂文的数量之多确实是十分惊人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当然，评判一种文体的成就与价值，主要的依据并不在数量，而在它的质量，尤其是作品在社会、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谈到中国现代杂文时，人们往往爱用“一代史诗”加以概括，这大致是不错的。然而却决不是“史”的意义和“诗”的魅力的简单迭加。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一代史诗”，应当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按照鲁迅的说法，杂文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产物。这是在传统文化的纵坐标和现实社会的横坐标的交汇点上的战斗批评。因为中国现代杂文作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

---

<sup>①</sup> 丁玲、魏金枝、郑拾风、谢觉哉、廖沫沙、艾思奇等虽有杂文集问世，但已是在建国以后（所收作品系解放前的），因而他们也应划归此类作家之列。

<sup>②</sup> 夏衍《杂文与政论·后记》。

十分严峻的课题：一是要全面清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推翻现行的专制制度，因为它们都是压迫人民、束缚人民，使中国人无法获得真正解放、无法争到真正的“人”的价值的桎梏；二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改变中国人的素质、性格，使人人自觉、自立，“致人性于全”，“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显然，“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批评，是从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人的精神之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批评中国固有的文明，是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批评人生的病苦。这显然是一个必须世代相续的伟大工程，而中国现代杂文作家作了良好的开端，树立了一种不朽的风范。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坚决性、广泛性、恒韧性，对断伤人的种种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作了猛烈的抨击，大胆的扬弃。

第二，他们在展开以“人”为中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时，决不仅仅停留在它的表层上，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而是钻探到了种种痼疾的内层和核心中去。在这种深入的观察和剖析中，首先思考的是它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吴稚晖、周作人、刘半农到三十年代的瞿秋白、邹韬奋、茅盾、唐弢、徐懋庸、阿英和四十年代的王任叔、聂绀弩、夏衍、闻一多、胡风、宋云彬、郭沫若、冯雪峰等，都曾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抨击，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消除封建主义传统在政治领域的种种表现，克服等级特权、专制作风、官僚主义等遗风陋习，建立真正平等的民主体制和法制；同时，作家们还紧紧抓住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原因，特别是心理层次这个广阔的思维空间——民族心理中的种种封建主义意识积淀的沉重负荷，大大发展深化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对“国民性”问题的发掘改造工作。在这里，作家们并不追求抽象的思辨，也不追求建立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从大

量日常生活和日常观念入手，从生活之树上汲取养分，用哲学的烛光和生命的情感去对待那些本来处于沉睡状态的事象，化腐朽为神奇，终于使碎金细玉般的篇篇杂文，汇聚成为深入中国社会底蕴的巨幅画卷和具有“史诗”气魄的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以致郁达夫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鲁迅的伟大》）郁达夫所说的是鲁迅杂文的价值，而一部中国现代杂文史，无论如何要比鲁迅自己的杂文更庞大、更丰富、更生动。

这的确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和奥秘，只能首先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这样一个烂熟的命题中去找寻。

## 一 时代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的时代意识

“五四”开始的文学意识具有前所未有的求新和探索精神，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个民族的文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振荡之后，正在力图以全新的面貌昭示于世。活跃而又深刻的文化更新，是在中国政治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期和间歇期进行的，两者的交织必然推出一种崭新的文学意识。虽然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或一个定义对这种文学意识作出一览无余的确切概括，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相对于过去的文学意识，现代文学意识十分注重审美的“理性”色彩。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笛卡儿，面对森严的经院哲学与神学思想，强调要把一切事物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重新加以衡量。“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衡量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为生活的发展寻找一种合理性的逻辑，社会性

思考是第一要义,这就必然要求更鲜明的“理性”审判。反映在文学上,作品能否深入剖析传统和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能否在情感观照中作出臧否、褒贬,成为成败的关键。对此,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是心领神会的,茅盾之所以要求新文学“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sup>①</sup>,李大钊之所以强调新文学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和“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sup>②</sup>,原因莫不出于此。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品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将“想象力和逻辑的力量,直觉因素和理性因素平衡起来”<sup>③</sup>。然而要在小说、戏剧等以客体对象为表现主体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实现这种平衡,毕竟太难了,弄得不好,作品的理性就会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使叙事文学的艺术遭到扭曲或破坏,误入人们常常指责的那种艺术“歧途”。五四时期产生的某些“问题小说”后来时常遭到非议,就是明证。因此,要强化“形象文学”的理性色彩,是一条充满艰辛而又不易成功的危险之路。时代在急切地呼唤着一种可以直陈事理的“观念文学”(巴尔扎克在《拜耳先生研究》中,曾把文学分为“形象文学”和“观念文学”两种)。于是,杂文便应运而生了。由于杂文的议论性特质,使它不仅能够赤裸裸地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感,以情感人;而且最易于直陈事理,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若干形象感知的中介环节,迅即对社会现象作出反应,“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sup>④</sup>。这是个平衡“想象力和逻辑的力量”、“直觉因素和理性因素”的最理想的世界。杂文在五四时期之所以能一触即发,迅速崛起,并且随着时

---

① 《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

② 《什么是新文学》,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③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④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间的推移而步步深化，正是它自身的特点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要求的结果。

当然，时代的杂文意识决不仅仅限于此，问题的另一面还在于时代本身能为杂文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由于杂文创作是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同时并行的复杂性精神劳动，最需要宽容、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利于作家激情的喷涌，构思的驰骋，理性的感悟，进入“纵心所欲，无所顾忌”的艺术境界。五四时期，由于清王朝的解体，科学与民主的张扬，政治禁锢被冲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这样的开明和宽容的气氛，这对于杂文的生长无疑具有直接的重要性。周作人强调小品文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sup>①</sup>，正是切中肯綮的识见。“五四”过后，尽管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四十年代还出现过种种明明暗暗围剿杂文的文化势力、政治势力，然而杂文仍然在时代的襁褓中生生不息。这是因为，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任何人为的阻遏都无济于事。“一种体裁或风格既已奠定，就成为一种风尚，一种传统，尽管时过境迁，还本着习惯势力，长久维持它的统治地位”<sup>②</sup>，有时还会因人为了的阻滞而积蓄起更强大的力量，即所谓“不塞不流”。“五四”以后杂文的发展就正是这样。同时，“五四”开始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还带来了新闻事业的极度繁荣，各种报刊大量涌现，彻底结束了古人所痛心疾首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的历史，为杂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条件：一方面，由于不少报刊的新闻一反过去以铺叙男女风流韵事和社会轶闻以取悦读者的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反映各种生活、各种信息、特别是各种社会问题为己任，这就使杂文作者能迅速地从中捕捉素材，触发灵感，完成作品的创作；同时，这些报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②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第32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刊也以显著的篇幅刊登杂文，反过来刺激着杂文的产生。自然，这里还潜藏着一个广大群众的审美趣味的变化问题。由于五四时期及其后社会变革的急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和生存竞争意识日益显现出来，人们变得心神飞跃或骚动不宁，已难以有闲情逸致去仔细品尝那些精美的东西，耽于“象牙之塔”作艺术悠游，果戈理所说的“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已成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的焦点。这样，在文学上必然出现对创作时空的“近距离”要求，必然要求展示那些正在展开的、旋转的、流动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生活、观念、思想等等，这无疑使不少“形象文学”陷入在近距离赛跑中保持平衡的两难局面。杂文的短小精悍、随意而谈、纵横捭阖等特点，正有摆脱这种困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让群众心理得到直接的满足。鲁迅曾敏锐地发现群众的这种审美变化：“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Essay，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者为限”<sup>①</sup>。读者的因素又从另一方面影响和促进着杂文的生长。

“特殊的时代常常会产生特殊的文体”<sup>②</sup>。如果说，荷马史诗是古希腊“英雄时代”对文学的选择的结果，但丁的《神曲》是文艺复兴对文学的选择的结果，荒诞派戏剧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对文学的选择的结果，唐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对文学的选择的结果，那么，杂文则明显地属于中国现代新民主主义运动对文学的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选择发生在文化更新、思想更新和动荡不已的历史发展的关头，显得异常迅即、生动而又顺乎自然。

在弄清了时代的杂文意识之后，还应弄清杂文的时代意识。当时代选择自己的杂文意识的时候，杂文也必须选择好自己的

<sup>①</sup> 鲁迅致江绍原信，编号271120。Essay，即随笔，也译作杂文。

<sup>②</sup> 《茅盾散文集·自序》，天马书店1933年版。

时代意识，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前者是形式的，后者是内容的；前者是时代对文体的审美需要，后者是文体对时代的历史职责。杂文选择时代意识的成败得失，不仅决定着自身价值的高低，而且也反过来影响着时代对杂文的选择：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但却从未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学意识，因为过去的作品常常只是站在时代之外来满足读者的某些需求。只有当杂文这种文体自觉地站在时代之巅，充分地体现时代精神的时候，一种真正的时代的文学意识才会产生。在这方面，中国现代的杂文实现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马克思在分析德国专制制度时说：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sup>①</sup>。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制，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鲁迅《坟·灯下漫笔》），以致使中国终于发展成为可以任人蹂躏的绵羊之国、沙聚之邦。因此，人的价值的发现与强调，个性的解放，不仅是使德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的实际途径，而且也必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关注的焦点。当时的先驱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同的信念：中国社会的进步应当以个性发展为前提。这是他们对封建传统进行全面反思后作出的判断。陈独秀在发起“五四”启蒙主义运动时就大声疾呼：“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力，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sup>②</sup>周作人则极力倡导一种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理

---

①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独秀文存·敬告青年》。

论(《人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在经历了原始时期的“人类的文学”和阶级社会的“阶级的文学”之后,发展到现代社会就必然是“个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文艺的讨论》)。①这些见解都表现出了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追求。这是一个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命题，作为全社会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时已经为不少启蒙主义者所接受、确认，引起了整整一个时代思想观念和文学传统的重大变化。所以鲁迅后来总结说：“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②。

“五四”杂文的时代意识尽管有丰富的内涵和题旨的多向性，但却正是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喊出了自己的最强音。最引人注目的是鲁迅的《热风》。它的广泛的取材，丰富的内容，都是以“人性”的解放(或曰“立人”)为轴心的：对于家族制的暴露与批判，目的在于动摇封建宗法社会的基础，从根本上破除禁锢人民思想和束缚人们手脚的桎梏，解放“人之子”；对于“国粹”的取舍与评判，“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随感录三十五》)。在鲁迅看来，所谓“国粹”，不过是一种陈腐野蛮的东西，一种与新事物抗衡的口实，是阻碍中国人走向觉醒与解放的绊脚石，实在没有保存的必要。这些作品对愚昧迷信的揭露和抨击，也与“人”的觉醒息息相关。《热风》几乎全力以赴地抨击阻碍民族觉醒的形形色色的封建樊篱。而贯穿其中的对“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精神的剖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主体情绪，都鲜明地体现了“立人”的思想。可以说，《热风》中形成的以“立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是五四时期杂文创作的主旋律。正是为了参加

---

① 周作人的这几篇作品均见《艺术与生活》。

② 《草鞋脚·小引》，见《且介亭杂文》。



这个旋律的合唱，周作人才大力鼓吹“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幼者本位观”（《谈虎集·祖先崇拜》），“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新道德观（《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新的“两性观念”（《狗抓地毯》，《语丝》第3期）；钱玄同才极力反对空耗少年光阴的“读典”行径（《随感录四四》），反对“不拿人当人”的非人道主义观（《回语堂的信》，《语丝》第23期）；刘半农才不满时下流行的“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半农杂文·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章衣萍才极力反对对“青年个性”的压制（《古庙集·“不行”、天才的权威》）……至于他们对束缚人走向解放的禁欲主义、贞操观、节烈观等封建伦理道德展开抨击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自身的局限，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常常有意无意地将人的主观精神力量作了过分的夸大，几乎夸大到列宁所说的“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sup>①</sup>。但平心而论，这种偏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严重禁锢人的主观精神的封建专制的“铁屋子”面前，这种“矫枉过正”、毫不妥协的偏激，远比那些左顾右盼、躲躲闪闪、八面玲珑的作品要切实得多，非如此便不能撼动旧铁屋的一片瓦砾、一根毫毛的。鲁迅说这是“物反于极”，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一种历史的反叛和惩罚。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偏激就没有当时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克服传统的巨大惰性力而实现人的觉醒和社会改革。这些作品是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对中国封建传统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省和批判。与以上作家作品相比，李大钊、陈独秀等关心得更多的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帝国主义入侵等重大政治问题，这

---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